

论国家文化疆域的巩固及路径拓展

潘可礼 张之沧

〔摘 要〕 文化疆域是人们认同某种文化的地域范围,以及这种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各种文化认同的标志将一定族群长期聚合在某一地域中,形成了带有明显文化边界的文化疆域。地理疆域被人们加工、反映和升华为理想的生活世界,融进文艺、诗歌、语言、典籍等文化形式里,成为想象的疆域。由于人们文化疆域观念不强、持有错误的语言观,以及一些地方文化分裂主义抬头等,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提供了突破口,给国家文化疆域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巩固和拓展国家文化疆域,要增强主体的文化自信心,牢固树立文化疆域意识;热爱民族语言,树立“大地性”语言观,防范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增强主流文化影响力,以文化为纽带构建身份认同。在推动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动力因”中,文化认同的力量远大于经济和军事力量。

〔关键词〕 文化疆域;拓展;文化认同;路径

传统疆域观念总是与边界、边疆相联系,把疆域视为被泾渭分明的边界所包围的封闭区域。“疆域”概念源自先秦,“疆”本义是“界”。“域”的本义是“封境”,有场所、境地和范围等含义。“疆”与“域”合为“疆域”,意味着一定边界范围内的国土。在传统法学中,国家疆域由陆疆、水疆、空疆三部分组成;疆域呈三维立体形状且被边界线所包围。^①有学者认为,国家疆域由其占据或控制的地域组成,疆域问题的核心是国家的占据或控制行为;^②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是边疆,即国家疆域中一个有意划定并对其采取特殊的方略和政策进行治理的边缘性区域。^③这种将文化疆域和网络疆域排除在外的传统国家疆域观念,具有极大危害性。它误导人们重视守卫地理疆域,忽视守卫文化疆域和网络疆域,对文化侵略和网络入侵活动视而不见,从而造成安全隐患。我们认为,国家疆域是一个国家、民族创造和生产的空间,包括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网络空间,即地理疆域(陆疆、水疆、空疆)、文化疆域和网络疆域。文化疆域是人们认同某种文化的地域范围,以及这种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它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是一种亦真亦幻的美好生存空间。

潘可礼,哲学博士,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无锡 214153);张之沧,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本文是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空间性教学模式’构建研究”(21MLD003)的研究成果。

①刘小冰:《中国国家疆域的宪法定位》,《学海》2004年第3期。

②周平:《国家的疆域:性质、特点及形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③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

一、文化疆域:真实和想象的美好生存空间

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既有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也有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人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文化群体的归属问题,实质上是回答“我是谁”以及个体身份识别和定位的问题。各种文化认同的标志,例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饮食方式、节庆、婚丧嫁娶习俗等,汇成一股强大的文化粘合力,将一定族群长期聚合在某一地域中,形成了带有明显文化边界的文化疆域。文化疆域并非与主权国家的地理疆域一致,一些实力强大的文化经过长期向外延伸和扩张,形成了由一个或者几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同心圆式文化圈。

(一) 文化疆域的结构:中心与边缘二元分立

文化疆域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表现为中心与边缘二元分立的結構形式。中心控制边缘,边缘依附于中心。

首先,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分别被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占据着。主流文化所占据和分布的地域,居于文化疆域的中心地带。文化疆域的中心地带位于国家领土的中心,是以首都为中心,以城市、村镇为节点组成的一个文化辐射圈。它意味着文明、正统和开化,是生活富裕、经济发达的区域。主流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变远而逐渐减弱,使得居住在边缘区域族群的文化个性彰显,与主流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于是,边疆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即被亚文化占据的边缘地带。

其次,中心地带控制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依附于中心地带。边缘地带作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长期承受着中心地带的影晌和辐射。在中华文化疆域内部存在着一条清晰的文化分界线,分隔开了儒家文化和非儒家文化。一边是“礼仪之邦”,另一边是“蛮夷之地”。“教化”和“开化”非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义不容辞的天职,也是古代仁人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在长期实践中,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积淀为民族精英的潜意识,滋生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涵养了崇高的“无我”境界。

最后,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相互转化。一些被主流文化覆盖的边疆地区,通常被人们当作中心地带。处于国土边缘地带的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从来不是边陲,而是中心地带。相反,甘肃、贵州和青海远离边境地区,却被人们视为“边疆”。事实上,无论是甘肃的省会兰州市,还是宁夏的首府银川市,均位于中国领土的地理中心线附近。概而言之,中原与边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疆域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隐喻;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疆域和边疆之说。

(二) 文化中的世界:想象的疆域

地理疆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被人们加工、反映和升华为理想的生活世界,融进文艺、诗歌、语言、典籍等文化形式里,成为容纳心灵的精神家园。在每部优秀文艺作品中都蕴含着一个世界,向阅读者和欣赏者敞开,接纳他们入住。“作品在自身中突现着,开启出一个世界,并且在运作中永远支持这个世界。”^①艺术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商业产品,是因为作者在创作时把真理、澄明之境“设置入作品”中。在梵高的名画《农民的鞋》中,一双破旧的、沾有泥土的农鞋,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认为这双鞋的主人是一位农妇。她日出而作,日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落而息,辛苦劳作,看护着庄稼生长,静待春华秋实。^① 詹明信认为,梵高的这幅画把早已隐没的客观世界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农妇的生活世界,包括“大地”和“人间”两部分;“依我的看法,‘大地’可解为大自然界及人体躯壳所占据的物质领域,而‘人间’则可视作那些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境况及社会现实。”^②

语言中有家,能给人们的心灵安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③意思是说,语言呈现存在;在乡音、绘画语言、诗性语言等语言形式中有被表达和呈现的精神家园。方言是未经雕琢的语言,裹挟着乡情和泥土气息。“老乡见老乡”之所以令人“两眼泪汪汪”,是因为老乡充满家乡味的地道方言,勾起了游子对家乡和故土的记忆,为其增添了无尽的乡愁。语言这个“家”分为物质、情感和思想三个层次,对应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即物质世界、情感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或柏拉图的理念世界。^④ 三个世界地位不等,界限分明。一个事物一般只能隶属于一个世界,唯有语言是个例外,囊括了三个世界。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由震动的空气层、声音和物理符号等物质形态组成,属于第一世界。语言能表达人的情感、心理和激情,就这一点而言,属于第二世界。语言具有描述和论证功能,各种理论、命题和陈述等组成了第三世界。

在《山海经》里,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组成中国疆域。中国疆域以《中山经》所记地区为中心,东至东海,西至大漠之外,南到南海,北面覆盖无启、深目、钜燕等国。《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山川、河流、矿物、人、动植物,以及村落分布、生活方式、祭祀场所等,甚至精确地测绘出了各个山川的地理位置及其之间的距离。然而,《山海经》里的中国疆域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疆域,而是文化疆域,亦即充满神灵、奇花异草和杂交物种的想象疆域。“整个世界(和宇宙)是方形的,由中心向四周辐射,虽不对称但不失平衡……中心和外围有着明显的区分……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路径表现为一系列同心正方形,离中心越远越蛮荒。”^⑤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大同世界”“小国寡民世界”“桃花源”等精神家园。它们激励着人,让人遐想,给人期盼,被人们内化为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

总之,文化疆域是地理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真实和想象、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辩证统一。它在亨利·列斐伏尔那里,是“生活的空间”,兼具“感知的”物理空间和“构想的”精神空间双重特征。^⑥爱德华·索杰称之为“第三空间”。^⑦

二、国家文化疆域的安全隐患

中国文化疆域是指浸染着中华文化的中国地理疆域,以及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占据着中华文化圈的核心部分,“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⑧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文化圈被持续地拓展,国家文化疆域被坚定地捍卫和守护,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然而,由于一些人文化疆域意识淡薄、持有错误的语言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第18—19页。

②[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36页。

③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④[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⑤[加]罗伯·希尔兹:《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谢文娟、张顺生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⑥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p. 40.

⑦[美]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杨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观,以及一些地方文化分裂主义抬头等问题,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提供了突破口,给国家文化疆域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一) 国家文化疆域遭受侵占和瓜分的隐患

长期以来,一些人文化疆域意识淡薄,持有错误的疆域观念:疆域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具有文化涵义;人们保卫疆土、戍守边疆,需要战马和刀枪,乃至血洒疆场,以笔墨纸张为武器捍卫国家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文化疆域意识淡薄的人,是一群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无动于衷,并且需要呐喊才能醒来的“沉睡者”。这些精神麻木且处于沉睡状态的“戍边人”和“拓疆者”,给国家文化疆域带来了极大安全隐患。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利用战争手段,而且凭借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拍摄电影,兴建学校、医院、福利院等文化手段,侵略中国。它们先摧毁中国人的精神防线,占领“想象的疆域”,然后再用武力手段侵占和瓜分地理疆域。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有学者统计,截至1922年11月,西方国家在华创办的学校中,在校生人数33.27万,占中国学生总数的6.25%。^②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中国办校,一方面促进西学东渐;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渗透了西方价值观念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客观上,为文化疆域带来了安全隐患。

当旧中国变成“睡狮”,大批民众因受精神鸦片的麻醉失去了家国、天下意识和战斗精神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地理疆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仅凭借25条军舰和1万余名步兵就打败了清政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和法军分别出动1.8万人和0.72万人,以如此少的兵力就占领了首都北京,并且火烧圆明园。“九一八事变”以后,汉奸满城,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1937年,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感慨道:“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③

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不仅从未停止过文化侵略活动,而且通过各种形式加大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力度。一些网络“大咖”“公知”积极配合相关文化侵略活动,并对其歌功颂德。他们误导了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年人,致使其疏于防范文化侵略,增大了国家文化疆域被侵占和瓜分的风险。

(二) 国家文化疆域根基被动摇的隐患

语言符号是组成文化的基本元素,是文化疆域的根基。歧视和抛弃母语的行为,是自我断根的愚蠢举动。1915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主要内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东方学”影响下,持有错误的语言观,误将汉字作为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喊出了“汉字不灭,国家必亡”的口号。^④

1918年4月,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提出“废孔学”和“废汉字”的主张。理由是,汉字字义含混,语法不严密;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难以辨认和书写;汉字只能代表古代的幼稚思想,不能代表新世界文明。钱玄同建议,创造一种言简意赅的“ESPERANTO”文字替代汉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9—630页。

^②刘卫、徐国利:《胡适论西方在华教会教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③薛光明:《当代祭黄帝陵纪实》,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④周德藩:《热爱母语,学好中文,提升中国教育品质》,《语文世界》2011年第1期。

字。陈独秀同意钱玄同的“废汉字”主张,并建议用罗马字母取代汉字。^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计算机刚开始在中国普及,还没有汉字输入软件。一些人竟然断言:汉字无法被输入电脑,必将被拼音文字替代。^② 在现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中,语言学被归入非意识形态领域,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形式逻辑等一部分社会科学不具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不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不服务于特定经济制度和特定阶级,因而属于非意识形态。”^③ 总之,一些人持有错误的语言观,过分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将其视为与意义和意识形态无关的中性符号。在这种错误语言观的误导下,人们疏于防范语言帝国主义灭绝民族语言的罪恶行径。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由音响形象和概念组成。音响形象是能指,概念是所指。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语言符号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的音响形象,即震动的空气层、声音,总是与“很倒霉”的意识纠缠在一起。^⑤ 语言符号带有随意性特征,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随意约定关系。人们可以任意地约定和赋予所指某种意义,譬如将帝国主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约定为一些语言符号的所指。语言符号也具有强制性,一旦被赋予某种意义,人们就不能任意改变它。例如,英语单词 *underdeveloped* 被赋予“落后的”和“原始的”内涵。它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术语,其前提其他文化应该沿着达尔文主义的路线进化到西方“文明”的高度。此外,英语语言被赋予了“文明”“发达”和“现代性”等含义。相反,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被贬低为“部落”语言,并强加给它们“落后”“野蛮”和“过时”等含义。人们不禁疑问:英语按照什么标准把只有二百万人口的挪威人称为人民,而把与它相同数量的乌干达人称作部落人呢?又是什么标准把只有几万人的冰岛人称为人民,而把四百万人口的豪萨法拉尼斯人称为部落人呢?答案只有一个:语言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暗中作祟。^⑥

改革开放伊始,一些人仰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自己定位为落后者和学习者。他们盲目崇拜它们的语言、意识形态、科技、生活方式等,对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丝毫不设防。当前,一些人已经掉进了帝国主义国家精心设计的文化侵略陷阱中,却不自知。斯里兰卡的一位政府大臣说:“美国只要拿出用于‘星球大战’计划十分之一的钱用于推广英语,亚洲所有的国家就会听命于美国总统。在英语国家的武器库中,英语是比‘星球大战’武器更厉害的国之利器。”^⑦ 戴(Day)说:“那些教授英语的和平联合会的志愿者们,不只是教师,还是语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凶,干的是灭绝落后国家语言和文化的罪恶勾当。”^⑧

(三) 国家文化疆域遭受分裂的隐患

文化断层线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分界线,最著名的文化断层线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和东正教文化之间的界限。这条文化断层线上冲突和战争不断,塞缪尔·亨廷顿称之为“血腥的伊斯兰边界”。^⑨ 我国边疆地区大多处于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断层线上。近年来,文化分裂主义在边疆地区有抬头倾向。“台独”“港独”“藏独”“疆独”等势力,积极构建对抗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试图

①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2013 年 5 月 3 日, <http://www.71.cn/2013/0503/712024.shtml>。

②周德藩:《热爱母语,学好中文,提升中国教育品质》,《语文世界》2011 年第 1 期。

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114 页。

④石安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语文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3 页。

⑥R.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8 - 39.

⑦R.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p. 9.

⑧R.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p. 13.

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32 页。

分裂国家文化疆域和地理疆域。“藏独”“疆独”的文化成因是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藏独”“疆独”分子带有反社会、反人类的极端仇视情绪,具有暴力犯罪心理倾向。“台独”“港独”分子挟洋自重,排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在这些分裂主义势力中,“台独”势力最为猖狂,因为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权被台独分子控制。一些顽固“台独”分子大搞文化“台独”和法理“台独”,热衷于“去中国化”,妄图切断与祖国联系的文化纽带,以达到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状况堪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意识形态,是一定族群用以身份认同的媒介。“台独分子”以语言改革的方式,将所谓“台湾主体意识”渗入语言中灌输给台湾新生代,以割断他们同中华民族意识的联系,使之拒绝认同中华文化,进而抗拒统一,妄想实现“台独建国”的白日梦。“台独分子”打着族群语言生存权和平等权的旗号,推行“乡土语言教育”。自2001年8月以来,台湾所有中小学生每周都上一学时的乡土语言课。一些“台独分子”极力推动“乡土语言教育”课程升格为初中生的必修课。^①台湾共有十几种语言,包括“乡土语言”和“国语”(北平话)。原住民族语言、客家话和Ho-lo话(台湾闽南话)是“乡土语言”。多数处于原始状态,近三成有音无字,或者有话无文,无法被书写和记录。一些文人使用汉字、阿拉伯数字、英语、方言、罗马拼音等,为“乡土语言”创造了文字、词语和句子,可谓是不伦不类。例如,“请赶快教孩子学习母语,否则就太晚了!”在“乡土语言”中被表述为:“请 kah 囡儿讲母语 b4(before) it's 2 late!”^②

在西部边疆地区,由于位置偏远和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加之一些人文化水平较低,没有固定工作,使得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在该地区的渗透呈现出加剧趋势。文化分裂主义主要通过书籍、电台和网站三条路径实施渗透活动。迄今为止,上述势力已经出版了百余种反动小册子和二十余种音像制品、书籍和报刊,涵盖汉、英、维、蒙、藏等文字。他们通过“麦加电台”“伊朗伊斯兰电台”“沙特吉达电台”等五个广播电台,持续地进行歪曲宣传。在美国、土耳其、德国、中(南)亚等地建立了20多个网站,例如“麦西来甫”“东突信息中心”等网站,制造虚假信息,毒害边疆人民的思想。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都登陆过反动网站,浏览过网页中的暴力恐怖音视频,受到了网络媒体舆论的蛊惑。^③文化分裂主义的渗透方式主要有思想洗脑、文化娱乐和慈善资助三种方式,即通过反复的舆论宣传、洗脑,控制人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电影、网站、节日、消费品等,将反动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通过基金会资助贫困家庭和大学生,趁机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

综上所述,在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的边疆地区,却涌动着—股分裂主义暗流,随时威胁着国家文化疆域和地理疆域的完整和安全,旨在彻底切断民族联系的文化血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具有断根性特征。它已经对国家文化疆域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冲击,有釜底抽薪之虞。

三、巩固和拓展国家文化疆域的路径

我国文化疆域虽然从总体上呈现出稳定态势,但是依然存在着被侵占和分裂的安全隐患。无论显现的表象如何多样,其深层原因必然是人出现了问题,即主体被异化。一些人作为生产、创造和守卫文化疆域的主体,被异化为自信心不足、歧视母语和家国情怀匮乏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必须从人出发探究巩固和拓展国家文化疆域的科学路径。

^①李行健、仇志群:《“文化台独”在语言问题上的表现及其政策思考》,《台湾研究》2017年第1期。

^②赵会可:《简析台湾当局语言规划中的“台独”属性》,《台湾研究》2005年第2期。

^③白旋婷、汤先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新疆高校的表现方式与特点分析》,《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一）增强文化自信,牢固树立文化疆域意识

文化自信意味着人们对某种文化认可、信任和信仰的稳定心理状态,包括文化自觉意识、文化家园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文化自觉意识意味着人的文化疆域意识处于觉醒状态。文化家园意识是指人们生成了在文化疆域中建造精神家园并安家于此的意识。文化使命意识是指人们牢固树立了保卫、巩固和拓展祖国文化疆域的责任意识。概而言之,自信是人的一种意识状态,人一旦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就会自觉地守护、保卫和拓展文化疆域,亦即牢固树立了文化疆域意识。

首先,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主要源头是儒家的性善论。性善论认为,人先天具有善良本性,人性与天、自然界的物性相互贯通。在处理矛盾时,中华文化强调同一性,主张阴阳调和,“一阴一阳,谓之道”。^①和合文化渗透进人们的饮食、服装、节庆、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融合进医药、建筑和艺术等领域,形成了中医文化、古典建筑文化和京剧文化等文化形态。和合文化描绘了秩序井然、天人合一的宇宙,万邦协和的世界,和而不同的社会,以及至善的道德境界,为炎黄子孙筑造了永久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基于人们在精神家园中安家落户的宁静心灵,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个性的信心和自豪。

其次,增强革命文化自信,反对文化侵略。革命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是民族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二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维护国家地理疆域和文化疆域完整的文化。革命文化的灵魂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的灵魂是共产主义信仰。革命精神不单是指激情、胆识和坚毅等心理品质,也有空间和境界的意蕴。在革命精神中,存有一种“无我”和“忘我”的崇高精神境界。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②有无相生,中国共产党人的“无我”境界本质上是“有他”境界,心中装的是党和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③“无我”境界,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人一旦涵养了“无我”境界,就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心和牢固的疆域意识,就会像革命先烈那样不惜牺牲生命保卫国家疆域。

最后,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拓展国家文化疆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为现实性文化和理想性文化两部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是现实性生活,探讨这两个生活领域意义的文化,我们称之为现实性文化或实用性文化。它体现为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和物质的生活意义。人们的精神文化具有无限的、超越的生活意义,能为人们提供精神关怀和心理慰藉,我们称之为理想性文化。社会主义理想性文化分为两个层面,下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核心的文化,上层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文化。理想性文化居于文化疆域的中心地带,是完美的“理念”和“原型”。社会主义现实性文化处于文化疆域的边缘地带,是“理念”的“模仿品”。理想性文化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终极生活理想,一经形成,便沉淀于民族文化中,构成了该民族潜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稳定性极强。

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拓展文化疆域,需要文化工作者在理想性文化中“创建存在”,为人安家,让人有家。“创建”即“命名”,而“命名”即“令”。^④他们的“命名”活动“令”文化作品中遮蔽着真理、存在,包含着美学意蕴。当阅读者欣赏作品时,真理、存在便自行敞开,接纳他们的

^①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②《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44页。

^④[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1页。

心灵入住其中。社会主义理想性文化中蕴含的存在、真理,是两个生活世界,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描绘的世界和共产主义理想世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一个美好生活世界:个人生成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想人格;社会上形成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良好风尚;国家呈现出一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图景。在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中,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人的发展互为条件,实现了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得到彻底解决,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路径不能只依靠知识“灌输”,关键是让人们的心灵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精神世界中安家。心灵有了“家”和栖居之所,人们才真正有了脊梁、骨气和自信心。

(二) 热爱母语,牢固树立“大地性”语言观

一个民族的语言功能下降、丧失,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民族意识的淡化。反对和防范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关键在于抛弃工具性语言观,牢固树立“大地性”语言观。

首先,语言扎根大地,大地会说话。人生活在大地上,大地是人用来与之交换物质、能量的“无机的身体”。一定族群通过生产劳动、科技创新和战争等实践活动改变和拓展了国家疆域,也把自身的审美、价值观念和信仰等主观意志融入其中,实现了主体客体化的转换,使疆域染上浓郁的民族风情。祖国大地不是一个冰冷的物质空间,而是充满情感的社会空间,即文化疆域。在它的物质面纱之下,凝结着开拓者、开发者和捍卫者的心血、汗水和情感。“社会空间是活的,在说话。它有一个情感的内核或中心。”^①在海德格尔看来,大地会说话,大地之言是大音,大音无声,是寂静之音;大地不仅会说话,而且能涌动和生长,人在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成长,人归属于大地;人说话是对大地召唤的应答,使无声的大音,变成有声语言,语言是人连接大地母亲的纽带;方言不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的发音器官有区别,而是人替地方、区域说话;方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存在的本真家园。“在方言中,总是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亦即大地(Erde)。”^②

其次,民族语言是各民族儿女应答大地“母亲”的“知心话”,是各民族兄弟姐妹之间交流感情的“亲情话”,承载着民族情感和历史交往记忆。中华民族历经 5000 余年发展历程,以及无数次大流动、大迁徙和大融合,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族人民在与大地“母亲”的交流中,以不同方式言说、“道说”大地,创造了 130 种民族语言,^③形成了以国家通用文字为主导的多民族语言生态系统。民族语言是各族人民应答大地召唤的独特方式。各民族语言源于一个根,共有一个家,同属于中华民族语言大家庭。民族语言是各族兄弟姐妹之间“亲情话”和汇聚情感的“情感丛”。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借来还去的美好“姻缘”关系。蒙古语的汉语借词“夫人”,读作 ujin,返还给汉语后,被音译成“兀真”。满语借用“兀真”后,演变成“福晋”。蒙古语借入汉语的“博士”一词,读音是 bagshi,含义是师傅,返还给汉语后则变成了“把戏”和“把式”两个词语。^④壮族、白族、哈尼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借用汉字的形声、会意和反切等造字方法,采用汉字的偏旁或者汉字,书写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用汉字笔画造出新偏旁,模仿汉字造字方法,创建了契丹大字和女真大字等表意方块字,被称为“变汉表意字”,简称“变汉字”。

最后,语言表达心声和“大地情结”。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各族人民生成了依恋祖国大地

^①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p. 42.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第 17 页。

^③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30 页。

^④纳日碧力戈、左振廷:《三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的心理情结,即“大地情结”。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指出,插队知识青年对黄土地和当地群众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普遍具有“黄土情结”。^①人依恋土地和人民的“大地情结”“黄土情结”,与女童恋父的“爱兰克拉情结”和男童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都是在无意识的驱动下生成的先验情感。在日常语言中,祖国大地被人格化为“父亲”“母亲”和“人民”。周恩来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大地的儿子”。^②邓小平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③习近平总书记把江山与人民等同,将其置于心中最高位置,自称是“黄土地的儿子”。^④显然,人们与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文化疆域有着割舍不断的亲情关系。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是后天教育得来的“学而知之”,而是“生而知之”。人们与文化疆域有着天然的、客观的亲缘关系。

(三) 增强主流文化影响力,构建身份认同

反对文化分裂主义、巩固国家文化疆域,需要人们用文化构建身份认同。“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⑤主流文化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人们以其为标准构建身份认同,赋予身份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唯有构建了身份认同的主体,才能与他人平等、和睦地长期生活在文化疆域内,共有、共建、共享物质或者精神家园。

其一,国家依据合法性认同原则,大力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各族人民构建平等的公民身份。所谓合法性认同是指,“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⑥近代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多数是通过战争手段掠夺和兼并他国领土而形成的。民族国家凭借法律、文化标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手段,赋予了个体平等的公民身份。人们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区别,在法律和文化上都是国家的平等公民。公民身份把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共同生活在文化疆域里。

国家依据合法性认同原则构建公民身份,意味着利用政权的力量重构价值观念,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旨在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生民立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主流文化的意义评判标准,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守和服从的内心道德法则和“绝对命令”。人们之间不论贫富、种族、宗教信仰等差别,皆是平等的关系。人们只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富强、社会和谐、自身完美以及他人幸福而工作,就会受到社会的褒奖和人们的赞美,就有地位、价值和尊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公民身份,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相互切换的过程。个人既要作为被动的客体学习、接受国家主体“灌输”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又要作为能动的主体消化和吸收它,用以确认自己的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

其二,人们依据拒斥性认同原则,构建个性身份。拒斥性认同是“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或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⑦每个国家既有主流文化,也有各种亚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

①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西部大开发》2012年第9期。

②苏叔阳:《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53页。

③郑晓国、南东风:《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

④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西部大开发》2012年第9期。

⑤[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⑥[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页。

⑦[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页。

位的族群,通过强化对本族群社会与文化地位的自我认知,表达对其他群体的不满,形成了带有身份认同的亚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为拒斥主流文化的同化,其成员以构建身份认同的方式,保存其文化特色。文化个性、多元性不排斥文化的统一性,也不意味着分裂国家文化疆域。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形成了既能促进基于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又能包容多样性族群认同的“多元一体”文化。

从国际上看,当前西方国家占据舆论优势,刻意贬低和污名中华文化。它们采用反恐双重标准,编造“新疆棉花事件”。用所谓的自由、人权和民主,离间中华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亚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挑拨下,一些亚文化圈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了主流文化,致使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式微。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压力,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有抵抗的责任和义务,自觉地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个性身份。个性身份意味着人的文化疆域意识觉醒,从“自在的人”转变为“自为的人”。“自在的人”完全处于盲目必然性力量的控制之下,毫无个性可言。类似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那些甘受命运摆布,在直线下垂运动中个性被泯灭的原子。^①“自为的人”是指在西方国家企图灭绝中华文化强大压力之下,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且生成了中华文化性格的人。他们恰似伊壁鸠鲁原子论中做偏斜运动的原子一样,挣脱了盲目必然性的控制,“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②,投身于建设新世界的实践活动。他们不仅通过学习、领会和顿悟中华文化的精髓,赋予了自己中华文化继承者和弘扬者的身份,而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话语,积极沟通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与各族人民一起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四、结语

国家文化疆域之所以出现“有疆无防”状况,关键是守护和拓展疆域的主体出了问题,即人被物化了。“物化人”因文化疆域意识淡薄、文化自信心不足,以及文化认同感欠缺等缺点,担负不起守卫和拓展文化疆域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③因此,巩固和守卫国家文化疆域的关键路径在于扬弃“单向度的人”。用中华文化重塑人的本质,即“以文化人”。培养有文化自信、热爱母语、认同民族文化的卫士和拓疆者。

中华文化是国家疆域的“粘合剂”和“动力因”。在中华文化粘合力作用下,国家疆域呈现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异常坚固。即使有巨大外力介入其中,也难以使其解体。要之,国家疆域的灵魂是文化和精神,外壳是物质和地理,本质上是文化疆域;灵魂失则地理疆域失,灵魂在则地理疆域在。鉴于此,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力量远大于经济和军事力量,“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笔指导剑”^④。

(责任编辑:陈 雪)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

③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④[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On National Cultural Territory : Its Consolidation and Approach Expansion

PAN Keli, ZHAN Zhicang

Abstract: Cultural territory is the regional scope in which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a certain culture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embodied in this culture. The symbols of cultural identity can bri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ogether in a certain region for a long time, producing a cultural territory with obvious boundaries. Geographical territory is processed and sublimated by those people and reflected in their ideal life world,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cultural forms such as literature and art, poetry, language, classics, and becomes an imaginary territory. People's weak awareness of cultural territory, wrong view of language, and the rise of cultural separatism in some places may provide chances for the imperialist cultural invasion, and bring many hidden dangers 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territory. The main ways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lor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territory are: strengthening the subjec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territory; loving the mother tongue, establishing the "earthbound" language view, and preventing the linguistic imperialism; strength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with culture as the link. Cultural identity is far more powerful th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ces in promoting the complet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Keywords: cultural territory; expansion; cultural identity; approaches

About the authors: PAN Keli,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xi 214153); ZHANG Zhicang,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